

宏观经济重大问题研究丛书

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与 工业化战略选择

王积业 王建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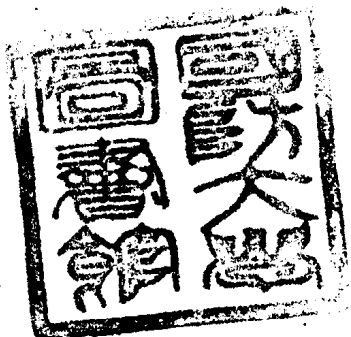
中国计划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3 3331 4

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与 工业化战略选择

王积业 王 建 主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6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与工业化战略选择/王积业,王建主编.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12
ISBN 7-80058-503-4

I. 我… II. ①王… ②王… III. 经济发展-经济战略-研究-中国 IV. F1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398 号

**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与
工业化战略选择**

王积业 王建 主编

☆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3号楼)

(邮政编码:100837 电话:68580048)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固安印刷厂印刷

787×1068毫米 1/32 6.125印张 137千字
1996年12月第一版 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

ISBN 7-80058-503-4/F·312

定价:9.00元

前 言

本书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完成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课题的成果。

本研究报告以我国二元结构这一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改革以来四个时期的发展演化为基本线索全面展开分析了二元结构矛盾在改革前后,主要是改革后4个时期内对我国发展与改革的深刻影响,以大量数据说明在改革和发展政策有利于二元结构矛盾缩小时,改革和发展就进展顺利,反之则充满了困难与障碍。

本项研究还从二元结构矛盾的演变趋势出发,得出了在二元结构矛盾再度强化的背景条件下,将难以保持我国经济在90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并朝重化工业升级方向发展的结论。而改革与开放作为缓解这一矛盾的重要条件,与80年代相比,力度显著减弱。恰在全面发动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改革后,二元结构再度复归的事实,则说明经济机制的变化,不仅不可能解决这一矛盾,还会成为激化这一矛盾的因素。

本项研究针对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发展主要障碍,提出了“双层分离”工业化战略的设想,主要是运用政府的力量创造出城乡经济双层双目标发展的态势,这一态势的形成,则有可能实现90年代的高速度协调发展,并提出了相关的配套政策。

本研究项目的主报告由王建执笔。分报告包括5个部分和1个附件,是按主报告的逻辑线索展开的。分报告之一由马

晓河执笔；之二由俞建国执笔；之三由王建执笔，之四由刘夏平、张立群执笔；之五由荀大志执笔；附件由杨晓兵执笔。张春泰负责了本报告有关数据的测算。

目 录

总报告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矛盾与 90 年代 经济发展的出路选择·····	(1)
分报告之一 经济发展的动力探源 ——兼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 ·····	(32)
分报告之二 治理整顿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其增长方式 的转折 ·····	(54)
分报告之三 在二元结构背景强化条件下 90 年代经 济发展中的矛盾分析 ·····	(86)
分报告之四 90 年代“双层分离”工业化战略 ·····	(105)
分报告之五 90 年代的经济政策 ·····	(129)
附件 战后实现经济起飞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的发展比较研究·····	(168)
主要参考文献·····	(188)

总 报 告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矛盾与 90年代经济发展的出路选择

一、我国二元结构矛盾的历史由来与现状

(一)发展经济学对二元结构的一般性描述

二元经济结构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二元经济”，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主要使用劳动力生产的农业部门，一个是主要使用资本生产的非农业部门。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包含着从农业经济到二元经济，再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增长转变这两个过程。

在从农业经济向二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从农业部门看，一方面出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大量转移，一方面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外流，出现了人均收入水平和剩余产品率的提高，这正是维持工业化过程和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前提条件。从工业部门看，首先获得发展的是需要资本投入较少的轻工业，这与该发展阶段以农业为积累资源是一致的。以后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指向发生了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转向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变化，由此诱发了对基础工业的需求，工业化过程相应进入到以资金集约为特征的基础工业主导发展阶段。当基础工业发展成熟后，工业化过程就进入到以资金—技术集约为特征的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当工业化过程进入到以基础工业和重加工

业为主导的重化工业阶段,也就到了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积累主源,已经从农业转换到工业,农业内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这一阶段大体上已完成。

(二)建国以来至改革前我国二元结构矛盾的产生与发展

1952年在全部国民收入中,农业所占份额高达57.7%,标志着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处在以农业为主向二元经济过渡的起步阶段。按照上述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我国工业化过程,应该有序地走过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加工业发展阶段。然而由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体制所决定,使我国在向二元结构过渡初期,就实施了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1952—1978年,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长了28倍,重加工业产值增长了40倍,而轻工业只增长了16倍,说明在改革前30年中,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既超越了以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也超越了以基础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直接跃进到了以重加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这两大跨越,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在四个方面的严重失衡,即在三次产业间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变动的严重失衡,轻重工业结构变动的严重失衡,基础与重加工业结构变动的严重失衡,和最终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这四大结构失衡中的核心,是轻重工业失衡,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有序发展,不仅反映着居民消费指向的变化,也反映着资金积累主源产业积累能力的依次递增。由于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跨过了以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积累主源就没有发生从以农业为主向以轻工业为主的升级性变化,结果是把重化工业发展的积累主源,始终放在了农业上面。

农业向重工业发展提供积累的基本方式,是以极度低廉

的价格向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农产品,从而压低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应扩大了工业内部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矛盾在于,以积累能力很弱的农业部门为积累主源长期支持重工业增长,一方面随着重工业的扩展要求,对农业部门提供积累的需求越来越大,一方面由于农业部门过度向外部输出剩余产品,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再生产的扩大,甚至遭到破坏,最终动摇了实施重工业超前战略的基础。

跨越轻工业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又一大矛盾是农业内部剩余劳动力的不断累积。因为轻工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轻工业难以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受到极大限制。结果是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长期停滞,剩余产品率趋于下降。实际情况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经历了 60 年代初期的挫折后,进入 70 年代以来长期停滞,1975 年农业不变价格劳动生产率比 1957 年还低 11.6%。到 1980 年也不过提高了 15.8%。农业生产率的长期停滞,使得在传统战略下发动的每次工业化高潮,都因农业无法支撑而宣告结束。所以,1979 年我国发动体制改革的深层原因,不仅在于传统体制中的各种弊病,也在于传统战略所导致的结构扭曲,使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存在二元结构特征,我国的工业化过程由于跨越了有序发展的两个阶段,工业的进步是以超强制地保持农业的落后为基本前提的,所以二元结构特征就更为强烈。二元结构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度量。美国著名数理统计专家库茨涅兹的统计研究表明,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 4.09 倍,我国在改革之初的 1979 年却高达 6.08 倍,为世界各国绝无仅有。1978 年,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看,我国二次产业所

占比重已达 44.8%，已具有人均 GNP3000 美元以上的中上等国家特征，而从劳动力结构看，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 70.5%，是人均 GNP200 美元以下农业国家典型特征。这就是我们站在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双重转轨时点时的产业结构背景。

(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结构矛盾的演变过程

17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9—1984 年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是 1984—1988 年的城市改革；第三阶段是 1989—1991 年的治理整顿时期；第四阶段是 1992—1995 年的持续较高增长时期。在这四个阶段的变化中，我国特殊的二元产业结构背景，始终是影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基本因素。以下从四个阶段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结构矛盾的演变过程。

第一阶段：农村改革时期。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发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在农业发端并取得成功，有其深刻的内在必然性。当时情况是，农产品供给长期严重不足，已难以继续为大工业发展提供积累，甚至难以维持城乡居民低层次的温饱消费水平。因此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恢复农业生产能力，解决全社会的温饱问题。解决的手段，是一方面改革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减少对农村的农产品征购量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农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发展中的生产潜力，使我国农业出现了自 1979 年以后持续 6 年的超常规增长。由于城市改革尚未起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结果，是大大缩小了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从而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引导收入从非农产业向农业转移。农业增长

与分配格局的改变,使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32.8%,提高到1984年的39.8%。

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使农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1979—1984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后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5%。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农村消费市场急剧扩大,农民购买的消费品在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52%,上升到1984年的59%,边际比重则超过了65%。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张,带动了消费市场的全面扩张,从而形成了对轻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使轻工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43.1%上升到1984年的47.4%。农业和轻工业的扩张,则使得重工业得以从长期的自我循环中摆脱出来,转向为农业发展和消费工业服务。所以,由农村改革成功和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就引发了国民经济增长格局的一系列本质变化 and 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转轨。

农村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全社会的温饱问题,改革也如期达到了目标。然而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它无意中触到我国二元结构矛盾这个经济发展中的主题。并使之缓解。6年农村改革中,国民经济增长的重心,沿着农业、然后轻工业的顺序变化,实际上是对重工业长期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过度发展不足的结构缺陷进行弥补或纠正,生产才能快速发展,改革才能取得成功。由于农业的迅速增长和农业产值份额的显著提高,我国用相对国民收入度量的二元结构强度,从1978年的6.03,缩小到1984年的3.58。反之,如果农村改革不是朝着这样的逻辑线索发展,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一阶段农村改革的成功,从发展的线索看,具有很显著的补课性质。因而其纠正二元结构的基本力量,是政府运用行

政权力从非农业部门向农业部门转移收入,纠正的基本方向是产值结构的变动,直到1983年,农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并不显著,农村人口所占比重甚至有所上升。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说明,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产值所占份额是要下降的,农业劳动力所占份额也是要下降的,从农业产值份额上升方面缓解二元结构矛盾,不是工业化规律所要求的基本方向,只能具有短期的补课性质,必将被从反映工业化规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角度解决二元结构矛盾的逻辑线索所取代。

第二阶段:城市改革时期。

农村改革的成功,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1984年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挟农村改革成功之势,创造了从1984—198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高达11.5%,是13年改革中增长最快的时期。

城市改革所诱发的城市经济高速增长,使职工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并且使职工消费结构水平跃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对以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为代表的新一代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强大需求。从1984—1988年,城镇职工家庭消费支出中,日用品和文娱品所占比重,从13.5%迅速提高到19.5%,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新一代机电消费品年均增长速度高达48.8%,是同期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的2.2倍。

城市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引起改革13年中,我国工业结构从传统轻工业向现代轻工业跃进的第一次升级。这一时期,工业总产值的现价年增长速度为20.9%,其中轻工业为22.1%,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产值增长速度高达26.4%,为工业各部门之最。

在城市改革起步和经历5年高速度增长的同时,开始出现了我国农村的工业化高潮。从1984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

产值年增长速度高达 44.9%，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增长了 4300 万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 1983 年的 67% 下降到 1988 年的 59.3%，同期农村人口比重也下降了两个多百分点。如果说第一阶段农村改革还没有从产业结构的本质方面解决我国三次产业间的结构扭曲问题，那么此时由于农村工业化高潮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出现，可以说已开始拉开了解决我国产业结构扭曲矛盾的序幕。

然而奇怪的现象是，以相对收入度量的二元结构强度，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继续减弱，反而出现了复归的趋势。到 1988 年，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从 1984 年的 3.58，上升到 1988 年的 3.89。

导致这一奇怪现象的本质原因，是这一时期农业产值份额的过快下降，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下降，以及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资金增密现象。我国农业在 1984 年取得大丰收后，就陷入了“一年减产，三年徘徊”的境况，1985—1988 年期间的农业增长率，只及前 6 年的 54%，粮食产量则出现负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规模，1984 年高达 1600 万人，其后两年维持了 800 万人的水平，1987 年减为 650 万人，1988 年进一步减为 480 万人，同期，1985—1988 年，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增长速度高达 21.3%，是前 4 年的 2.6 倍。

农业产值份额过快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趋于停滞，以及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增密现象，与我国二元产业结构背景是紧密联系的。经济增长理论说明，只要各产业间存在着相对收入差距，生产要素就有从低收入部门向高收入部门流动的趋势。日本在工业现代化的初期，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只有 2.94(1955 年)，台湾只有 2.39(1965 年)，我国当

农民温饱问题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基本解决后,这一要求就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由于1984年以后,农业生产还出现物耗急剧上升,净产值增长与总产值增长极不同步的现象,使农民务农显得更不合算,进一步增加了从农业内部转移生产要素的压力,最终导致农业的减产徘徊。

我国二元产业结构的显著特征,是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特别大。因此农村工业化高潮一出现时,就面对着庞大而先进的城市工业。城市工业虽然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出现了升级趋势,但是传统轻工业作为哺育新生产业的积累主源不会为农村工业发展轻易让出市场,这一时期体制方面正经历引入市场的深入变化,而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并不承认农村工业与城市大工业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不平等地位,所以农村工业为了求得与城市大工业在同一水平上竞争的實力,不得不在工业化初期,就采取资本替代劳动的增长方式,被迫放慢向非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速度,求得资金增密,以提高设备、技术和产品的档次与质量。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小棉纺”、“小酒厂”、“小烟厂”等几类农村小型企业,在城市轻工业升级后遗留下来的传统轻工业平面内,与城市工业展开竞争。

农业的停滞,最终演化成导致1988年第四季度被迫实行国民经济紧缩和调整的动因。调整的直接原因是物价过度上涨,而涨价因素中,有3/4是来自于农业停滞所诱发的食品涨价。农业停滞使农村经济收入的一个主源趋于增量的枯竭,农村资金增密所产生的强制积累要求,也压低了农民增加消费的能力。到1988年,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所占比重比1984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边际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农村消费的停滞,则给三年治理整顿中的市场需求疲软,潜伏下了危机的根苗。

第三阶段：三年治理整顿时期。

从 1988 年四季度开始，我国进入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导致紧缩和调整的许多直接矛盾趋于缓解，但是二元结构强度，不仅未有下降，反而继续加大。1991 年，我国三次产业间，农业与非农业的相对收入差距，从 1988 年的 3.89，已上升到 4.14，促使二元结构继续复归的因素也出现了新变化。第二阶段重新拉开二元结构的主因是农业产值份额下降过快，和由农村非农产业资金增密所导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势头衰落。第三阶段，由于农业丰收，农业产值份额下降速度趋缓，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逆向变化，和农村工业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资金增密趋势仍在发展，并且强化。具体数字是，农业 GNP 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从 1988 年的 27.2% 略降至 1991 年的 26.6%，农业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所占份额则从 59.3% 升至 59.8%。同期农村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增长速度更加缓慢，农村收入增长与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增长对比的弹性值，却从第二阶段的 1.88 升至 2.13，显示出更强的资金增密趋势。

第三阶段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城市消费需求结构的第二次升级。由于 1984 年以来家用电器类耐用消费品迅速在城市职工家庭中普及，到 1989 年，城市居民对这类产品的消费接近饱和，因而购买增长速度显著放慢。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日用品和娱乐用品所占的比重，也从 1988 年 19.5%，下降到 1991 年的 14.3%。同期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 26.6%，以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新一代机电消费品的社会零售额却下降了 10%。城镇居民的消费指向，目前正在向以住宅和汽车为代表的更高级耐用消费品移动，由于这类消费品价值高昂，居民为消费这类产品必须有一个较长

储蓄过程,因此在消费倾向显著下降的同时,出现了储蓄倾向的显著上升。

城市消费需求结构升级,诱发了改革以来我国工业结构的第二次升级。从1991年9月开始,我国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自改革以来,首次出现增长速度持续超过轻工业的倾向,并且差幅逐渐拉大。1992年以来,我国以现价计算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不足15%,远低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轻工业增长率,而投资增长率则接近40%,大大高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这些变化,都是由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所引发的。

在城市经济需求和供给结构同时升级的时候,农村居民消费在农业物耗上升和非农产业资金增密的压力下,却继续处于停滞乃至萎缩状态。1991年与1988年相比,扣除农村物价指数,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下降了4.6%,农村购买商品所占比重,也从1985年的57%,下降到1991年的53.5%。1989年以来的消费市场疲软的主因是农村市场疲软,因为农村9亿人口是我国消费市场的主体。农村消费需求,在收入减少和积累要求上升的双重压力下,在消费品市场中所占份额,从1985年就开始下降,自那以后至1988年的消费市场扩充,主要是在城市出现了新一代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而一旦城市需求转向更高档次而处于间歇式停滞时,农村消费需求停滞和萎缩对我国消费市场乃至工业生产的全面影响,就水落石出,暴露了出来。

城市工业转向重化工业增长方式,抛下的层面是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一代家用电器消费品。而农村工业在第三阶段的资金再次增密,也出现了从传统轻纺工业,向现代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升级趋势,出现了大批的生产电冰箱、空调器、电饭锅等产品的企业。城市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依

赖原有轻工业的哺育,不会自动让出市场,农村工业要想发展,仍然必须与城市产业升级遗留下来的原有层面展开竞争,这种情况与第二阶段城市产业升级后的情况一样,也是农村工业被迫继续采用资本替代劳动方式维持增长的原因。

问题在于,农村工业在第三阶段的再次升级,发展的产业与上一阶段相比,具有更强烈的资金集约特征,因而就具有更强烈的排斥劳动力的趋势。在1984—1988年的5年中,农村工业产值增长了3955亿元,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245万人,而1989—1991的这3年中,产值增长了3486亿元,吸纳的劳动力却减少了145万人。农村工业在城市竞争压力下出现的这种强制资金增密排斥劳动力的趋势,正是导致在第三阶段农业劳动力重新复归的原因。

问题还在于,农村经济在什么样的收入背景条件下实现资金再度增密。1984—1988年,虽然农业生产出现徘徊,为农村经济提供的收入显著减少,但是由于农村工业化高潮的出现,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却显著增加。治理整顿期间,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创造收入的增长幅度明显缩小,农业虽获丰收,但农业物耗的上升仍在继续,净总产值难以同步增长,因此这一阶段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只有年均1.3%,比第二阶段下降了40%以上。为了向非农产业增加积累,满足资金增密要求,农民在收入分配中,只能采取抑制消费,增加积累的方式,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在农村国民收入分配中,人均消费额实际年均增长率从6.2%转变为-2.1%,农村人均积累额实际增长率(按重工业产值平减指数扣除),则从4.2%上升为13.1%。农村积累率,相应从1988年的31.5%升至1991年的40.3%。

第四阶段: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时期。